

论清代有关乾隆朝英使 觐见礼的记述变化

刘 玉

内容提要 关于乾隆五十八年马嘎尔尼使团觐见礼一事，历来众说纷纭，不仅中英双方当事人记载不同，清代有关此事的记述前后也发生明显变化，乾隆时期的官方记述含意模糊。嘉庆时期则在官方记述中提出“恪恭成礼”说，构建英使团以三跪九叩之礼觐见的清晰表达，此说成为后世的主流观点。同光时期，马嘎尔尼使团觐见时行西式礼仪的记述相继现于报纸奏折，并被广泛征引。其后，三种记述及其观点并行不悖，影响深远。清人对乾隆年英使觐见礼仪的认识转变是与清代中西关系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关键词 清史 乾隆帝 英使团 马嘎尔尼 觐见礼 薛福成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马嘎尔尼^{〔1〕}(George Macartney)率团来华。奉行三跪九叩礼仪的“天朝”与坚持不损害自己君主尊严的英使团之间就觐见礼仪进行了艰难的持续协商。但是关于马嘎尔尼的觐见礼，后来中英双方的相关记述，或语焉不详，或各执一端，或前后变化，令人莫衷一是。嘉庆时期，因阿美士德使团的觐见礼问题，乾隆朝英使觐见礼的问题再次被提起。道光以后，中西接触不断加深，公使觐见逐渐升为中西之间的重大议题，清人对于乾隆朝英使觐见礼问题有不同的发挥。其后，随着中英频繁接触及其双方外交关系的显著变化，乾隆英使马嘎尔尼觐见礼的问题一再被提起，清人对此前后态度发生明显变化。

〔1〕 马嘎尔尼或马夏尔尼，学界多有混称，清代史籍中写作：吗嘎喇呢、马加尼、麦加尼、马格理、马格里等；使团副使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亦写作：呵当咚、呵噶咚、嘶噶唛等。引文中为保持史料原始面貌，对原译名不作统一，在个人行文中统一写作马嘎尔尼、斯当东。但将引文中所有“噶咕喇”一词统写作“英吉利”。

学界对马嘎尔尼觐见礼也多有讨论和不同意见⁴¹。如秦国经、王开玺、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认为英使行三跪九叩礼;刘家驹称在呈递国书时应是双膝下跪;普理查德(Earl H.Pritchard)和王曾才主张未叩头;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认为是行九次单膝跪地礼,但不曾叩头;朱雍等人以疑存疑,不下定论;黄一农则结合中英图文材料,提出中西两种礼仪在不同场合均有所损益使用。学者们对觐见形式探讨较为深入,各有持论,多集中在辨明史实真相方面,而对清人对此事件的认识变化则少为关注。本文则在梳理清代相关史料基础上,探讨清人对乾隆朝英使觐见礼仪的认知转变,厘清这一历史谜题的由来,从而为研究这一历史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路。

一 乾隆朝:官方记述含意模糊,民间记述各执一端

乾隆五十八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是中英政府之间首次外交接触,双方都很重视。英使团力图要“解除中国方面对英国的误会,并为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造成基础”⁴²,乾隆帝也告诫臣下(英使团)“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⁴³,要求接待官员“应接款待之间务宜加倍留心,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怀柔”,认为“使臣向微瑞行叩见礼亦无足为荣,即不行叩见礼亦何所损”,然而接到天津筵宴英使的奏折后,乾隆立即追问“免冠竦立”与“免冠叩首”是否为同一礼节⁴⁴,指示臣下暗示英使“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建议英使觐见时放开缚腿,行三跪九叩礼⁴⁵,松筠等人虽不断汇报英使“渐能跪拜”,但“使臣到热河后迁延装病,观望许多,不知礼节”,乾隆下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后鉴于英使“今

41 以往学界马嘎尔尼觐见礼仪多有讨论,限于篇幅,仅列举近年来学术界相关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论文包括,Earl H.Pritchard(普理查德),“The Kowtow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in 1793”,*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2.2(1943): 163-203;王曾才:《马嘎尔尼使团评述》,收入《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刘家驹:《英使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问题》,收入《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秦国经:《从清宫档案看英使马嘎尔尼访华历史事实》,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嘎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许明龙译):《兼听则明:马嘎尔尼使华再探》,收入《英使马嘎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王开玺:《马嘎尔尼跪谒乾隆帝考析》,《历史档案》1999年第5期;汪荣祖:《英使马嘎尔尼来访》,收入《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黄一农:《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7年第78卷第1期。论著主要有,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乾隆时期的中英关系》,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何伟亚(James L.Hevia)(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人民出版社,2009年。另有会议论文集二,张芝联主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Robert A. Bickers, ed., *Ritual and Diplomacy: th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 1792-1794*, London: the Wellsweep Press, 1993.

42 [英]斯当东(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页13,群言出版社,2014年。

43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一,乾隆五十八年六月戊寅,第27册页131,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44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二,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己亥,第27册页138-147。

4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八日,第17册页444,档案出版社,1991年。

既诚心効顺，一遵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¹，看似英使团最终遵行了清廷礼仪——三跪九叩。对热河觐见，清方接待大臣奏请英使觐见仪如下²：

卯初，请皇上御龙袍褂……照例于院内站班。臣和珅同礼部堂官，率钦天监副索德超，带领英吉利国王、副使，臣等恭逢[捧]表文，由避暑山庄官门右边门进呈殿前阶下，向上跪捧，恭递御前大臣福长安恭折转呈御览。臣等即令该贡使等向上行三跪九叩头礼。

奏折要求英使行三跪九叩之礼，但实际觐见时行礼方式缺载。至于觐见之日情况，《清高宗实录》则称“庚午，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英吉利国正使吗嘎喇呢、副使嘶噶喇等入觐，并扈从王公、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駙、台吉暨缅甸国使臣等赐宴，赏赉有差”³，《(乾隆朝)起居注》记“八月初十庚午，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英吉利国正使吗嘎喇呢、副使嘶当喇及副使之子哆吗嘶噶喇等入觐。召见，上各加温语慰问，赐英吉利国王玉如意，正、副使臣如意”，“十三日癸酉，皇上万寿圣节，上御澹泊敬诚殿……又英吉利国正使吗嘎喇呢、副使嘶噶喇、副使之子哆吗嘶噶喇，缅甸国王正使密渺莽那纳牙他、副使密渺南达觉苏细与南达梅济等三人，行庆贺礼，毕。是日，驻蹕避暑山庄”⁴。《内起居注》的记载与此类似，未曾明确英使实际行礼方式。可见，乾隆时期官方档案对于中英之间关于觐见礼的争论记载甚详，但对于英使实际觐见时行礼方式则语焉不详，意存模糊。

除了这些保存在内阁大库的官方档案，还有些乾隆时期的笔记、诗文记载此事。如，乾隆诗称“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恭顺。竖亥横章输近步，祖功宗德逮遥瀛”，并自注“远夷效贡恭顺”⁵。既称“恭顺”，则英使似应顺从清廷行三跪九叩之礼。而且，乾隆时的军机章京管世铭也称英使“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并解释说“西洋英吉利国贡使不习跪拜，强之，止屈一膝，及至引对，不觉双跣俯伏”⁶。同样，乾隆五十九年(1794)抵清的朝鲜使臣黄仁点、李在学亦称英使“朝见之时，不知礼数”⁷，暗示英使未行三跪九叩之礼，但鉴于朝鲜使团抵达时，英使团早已离京，故其所谓“朝见之时，不知礼数”，不足为信。另，“俄籍译员维特金(Vladikin)者，其时正在北京，及其他躬逢盛会之人，皆谓英国大使行其叩头之礼”⁸，与朝鲜使者说法又有所不同。可见，同时期诗文笔记关于此事的记载亦是各执一端，相互矛盾。

与此相映的，英使团成员回国后也留下了大量的与之相关的文字、图像等资料。使团成员威廉·亚历山

〈1〉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四，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丁卯，第27册页171。

〈2〉 前揭《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页600—601。

〈3〉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四，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庚午，第27册页172。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乾隆帝起居注》，第40册页199—20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5〉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四，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庚午，页172。

〈6〉 (清)管世铭：《蘊山堂诗集》卷一六《癸丑仲夏扈蹕避暑山庄恭纪》，《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3册页45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7〉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一，页4879—4880，中华书局，1980年。

〈8〉 [美]柔克义(W.W. Rockhill)：《欧洲使节来华考》，参见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译丛》页180，海洋出版社，1984年。

大(William Alexander)根据使团报告绘制了著名的使团热河觐见仪式图¹，图中使团正使采用西式单膝跪地礼，此图传播甚广；马嘎尔尼日记中自称“屈一膝行礼(kneeling on one knee)”²；斯当东也称“皇帝陛下已经允许特使可以以觐见英王陛下同样的礼节来觐见中国皇帝”，正式觐见时“特使通过礼部尚书的指导，双手恭捧装在镶着珠宝的金盒子里面的英王书信于头顶，至宝座之旁拾级而上，单腿下跪，简单致词，呈书信于皇帝手中。皇帝亲手接过，并不启阅，随手放在旁边”³；小斯当东亦称“当我们听说皇帝将到来时，就离开帐篷，站在御道旁。皇帝乘坐十六人抬的大轿，当他经过时，我们均跪一膝并俯首向地(we went upon one knee and bowed our heads down to the ground)”⁴使团正副使均称行的是西式礼仪，即单膝跪地。而使团其他成员也有著述及此，然表述不一。爱尼斯·安德逊(Aeneas Anderson)是使团成员中最早出版专著的，仅称“据说，皇帝是用最庄重的仪式接受大使的国书的”⁵；使团代笔文带(Edward Winder)称“我们按中国的常规行了礼，跪地九次(We paid our respect in the usual form of the country, by kneeling nine times to the ground)”⁶即行了中式的三跪九叩之礼。而巴罗(John Barrow)在1804年出版的《巴罗中国纪行》中辩称英使“拒不遵行老一套的向皇帝叩拜的礼节”⁷，表明英使并未行三跪九叩之礼。可见，关涉此事的英使团成员的著述也有矛盾，各执一词。

总之，乾隆时期清廷官方档案对于英使觐见礼表述不明，语焉不详。而同时期的乾隆诗稿、俄籍译员的记述及朝鲜使臣奏折中相关表述又让人难以信服，只有管世铭的诗文记载相对清晰，但若作为证明此事的确凿证据则仍显不足。何况，马嘎尔尼使团成员对此事亦有不同表述，更令人疑窦丛生。

乾隆时期这两种表述——模糊其事和称行跪拜礼——在后世清人的著述中都有所延承，如，陈康祺的《郎潜纪闻初笔》卷九、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六、赵尔巽《清史稿》卷九十一志六十六礼十《山海诸国朝贡礼》等基本沿用管世铭诗文说法，认为英使团觐见时行跪拜礼；而，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杂箸下、梁廷枏《海国四说》卷五、夏燮《中西纪事》卷二以及葛士濬《清经世文续编》卷一百一十一洋务十一等沿用官方档案的模糊记载方式，未曾明确指出行礼方式。

总体而言，乾隆朝官方相关记述含意模糊，并未明确英使施何种觐见礼；同时期笔记材料则各有持论，

〈1〉 [美]R·N·斯旺森：《马嘎尔尼使团档案资料追踪》，见于故宫博物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666，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2〉 J.L.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Hamden Connecticut: Archon Books, 1962, pp.122.

〈3〉 前揭《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页412。

〈4〉 George Thomas Staunton, *Journal of a Voyage to China, 2nd part*,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 Duke University, 1793-1794, vol.104, 其中划线部分表示手稿涂改痕迹。

〈5〉 [英]爱尼斯·安德逊(Aeneas Anderson)(费振东译)：《英国人眼中的乾隆盛世》页131，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

〈6〉 Edward Winter, *Account of a Voyage to Brazil, Tristan da Cunha and the East Indies*, 转引自Peyrefitte, *The Immobile Empir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2, pp.224-225.

〈7〉 [英]乔治·马嘎尔尼，[英]约翰·巴罗(何高济、何毓宁译)：《马嘎尔尼使团使华观感》页116，商务印书馆，2013年。

众说纷纭，这正是后人对此不断演绎的源流所在。乾隆朝官方记述的模糊回避与民间记述众说纷纭，则说明此时清人对此事的构建尚处于初始阶段，尚未定型。

二 嘉庆朝“恪恭成礼”说形成并成为主流

嘉庆时期，随着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使团的到来，有关觐见礼的争论进入高潮，此时众多官方档案与私人笔记所提出的相关证据基本上成为后世清人对此认知的主要材料。

嘉庆二十一年(1816)，阿美士德率团访华。早在使团到来前，嘉庆帝就强调觐见礼仪，指示“务将该贡使等礼节调习娴熟，方可令其入觐”¹，提出“将来行礼时，亦必派员带领，始克如仪。和世泰等当善为开导，使其敬谨顺从。凡事不可过于苛细，转失驭外之礼，即五十八年亦系将就了此一事耳”²。即使如此中英双方磋商觐见礼仪时仍未达成一致，嘉庆帝坚称乾隆时期英使“恪恭成礼，不愆于仪”³。粤海关监督苏楞额曾接待马嘎尔尼使团，也称“先朝大皇帝不准外国使臣行本国之礼，嗣经三跪九叩头，始蒙恩赉骈繁，礼遣回国”⁴，认为马嘎尔尼是行跪拜礼的。福建监察御史秦绳曾上奏“查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贡使初到热河之时，不谙旧礼……。嗣因该使臣恭顺行礼，仍叨宴赉有加”⁵，嘉庆朝君臣皆明确宣称马嘎尔尼使团觐见时行三跪九叩之礼。而小斯当东作为乾隆朝英使觐见礼的参与者，自称“乾隆五十八年来时所有礼节虽经目覩，实系年幼不记得”，表示“乾隆五十八年贡使等来朝回国时，闻得正使告知国王云，系照依本国礼节行礼，是以此次不敢更改”⁶，阿美士德声称“他打算以他向英国君主表达尊敬的同样方式觐见中国皇帝，这是马嘎尔尼勋爵的做法，也是他的君主对现在这个使团的训令”⁷。中英双方对马嘎尔尼觐见礼的说法截然不同，磋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导致最后阿美士德使团未及觐见就被遣送回国。

虽然双方关于觐见礼一事未达成一致，但彼此关于马嘎尔尼使团觐见礼认知的分歧反而加强与明晰了清廷关于此事的态度，清廷君臣上下都开始明确宣称马嘎尔尼实际以三跪九叩之礼觐见清朝皇帝，改变了以往乾隆时期官方记载的语焉不详、模棱两可。同时，此时的官方态度以及官方档案记载内容也成为清廷相当长时期内的共识，众多的官方文献、文人笔记等也采用了这一说法。如，《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1册页36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2〉 《清嘉庆二十一年英使来聘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文献丛编》第十一辑，页30，故宫博物院出版物发行所，1935年。

〈3〉 前揭《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页388。

〈4〉 前揭《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页360。

〈5〉 台湾“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5册页49，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

〈6〉 前揭《英使马嘎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页510。

〈7〉 [英]亨利·埃利斯(刘天路、刘甜甜译)：《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页65，商务印书馆，2013年。

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卷三百九十五礼部一百六十三、《覲事备查》卷五一四四、《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卷五百五礼部二百十六、《林文忠公政书》卷五一四四、《海国图说》卷六、《粤海关志》卷二十三、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十七、夏燮《中西纪事》卷三、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五十七市采考二及三百三十四裔考四、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朝)》嘉庆四十二、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七等，这些材料基本采自《嘉庆皇帝给英吉利国王敕谕》¹。

总之，通过追忆、对峙及皇帝个人意志的强调，嘉庆时期基本完成了对乾朝隆英使觐见礼的记述构建。

三 道光朝以来：行西式礼仪说开始流行

道光以来，清人对马嘎尔尼使团觐见礼一事的态度受时势变化影响很深，除了以往“恪恭成礼”一说，从同治十二年公使请觐始，有关马嘎尔尼使团以西式礼仪觐见的说法也开始频频报端。同治十二年《译西字新闻论西使将觐皇上》称“纯皇帝有谕，免行叩首礼，祇照平日觐欧罗巴各国君主之礼，可也”²。同治十三年《西使陛见考》称“英使屈一足”³。但此时，清廷诸臣在议及中英礼仪之时仍认为乾隆时期“犹得律以升殿受表之常仪”⁴。说明西礼一说仍不足以改变清廷主流态度。

光绪亲政前夕，西方诸国公使请觐的愿望日益强烈，清廷迫于压力不得不重新思考西使觐见礼仪一事。正是在此情况下，薛福成提出马嘎尔尼使团以西礼觐见一说，立即得到广泛响应⁵：

闻雍正年间，罗马教王遣使到京，世宗宪皇帝允行西礼，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遣使马夏尔尼（原作马格理，今依出使奏疏，据海国图志）来华，亦奉高宗纯皇帝特旨，准行西礼，赐以筵宴。未知礼部等衙门，是否有案可稽，似亦足备考证。

此则资料后被收入唐才常《觉颠冥斋内言》卷二、陈忠倚《清经世文三编》卷三十八礼政一礼政二、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光绪九十九，以及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三十九外交考三、《清史稿》卷九十一《志六十六·礼十·外国公使觐见礼》等书。

另，薛福成在日记中陈述更为详细⁶：

〈1〉 前揭《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页388—389。

〈2〉 (清)佚名：《译西字新闻论西使将觐皇上》，《申报》1873年03月22日。又见于《教会新报》1873年第231期，页11—12；《申报(上海版)》1939年5月22日，第16版。

〈3〉 (清)佚名：《西使陛见考》，《申报》1874年12月8日，第4版；又见于《申报》1941年9月17日第10版。

〈4〉 (清)李鸿章：《奏请斟酌时势权宜变通以定洋人觐见礼仪折》，见于宝璠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〇，页3624—3625，中华书局，2008年。

〈5〉 (清)薛福成：《出使公牍·奏疏》奏疏卷上，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09册，页16a—页17a，文海出版社，1972年。

〈6〉 (清)薛福成(宝海校注)：《出使四国日记》，页13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六日记。……考康熙年间,南怀仁官钦天监,后赠工部侍郎,凡内廷召见,圣祖皆许其侍立,不行拜跪礼。雍正年间,教王遣使到京,世宗许行西礼,且与之握手。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遣使马格里来华,礼臣与议礼节,彼以觐见英主之礼为言,仍愿演习礼式。礼臣据以双请,奉高宗特旨,准行西礼。筵宴日,上亲赐以卮酒。嘉庆中,英使复来,接伴大臣未与言明礼节,仁宗命由通州驰驿进见。及抵官门,上已御宝座,告以须行拜跪礼。英使司当冬,遂辞以疾。召副使,亦辞以疾。上甚不悻,停止筵宴赐物,并于赐英王书中叙及之。后召见两广总督孙玉庭,询以英使不肯行礼之故,孙公陈其源委颇晰,上始释然。此皆散见于诸家纪载者。盖道光以前,西使来华祇此数起。英人亦著之笔记,谓拜跪之礼万不能遵,故《天津条约》载明,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断不可行,即指此也。

此则日记材料后收入杞庐主人《时务通考》卷五、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以及赵尔巽《清史稿·外国公使觐见礼》志七十三礼十等书。日记中指出西礼觐见说来源有二:孙玉庭陈奏之词及英人笔记。

首先,孙玉庭陈奏之词可追溯到彭昱尧《前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孙公家传》(简称《家传》)、孙玉庭《寄圃老人自记年谱》(简称《年谱》)二文。二者虽同著于道光时期,但表意有所差别。《家传》著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¹¹,称¹²:

嘉庆二十年,英吉利入贡。其使不能行三跪九叩首礼,廷议以其崛强遣之,睿庙不悻。公适述职京师,召见垂问,以尝抚粤,悉夷情也。公面奏:“乾隆五十八年,英夷贡方物,使至京,已不能效中国礼拜之仪。其大班曰司当冬,尝于广东巡抚厅治拜领大皇帝赏物,弓身俯伏,臣亲见之。译者曰俯伏者,夷礼之免冠顿首也。今入贡之使即广东之司当冬,未有谨于彼而骄于此者。如其妄有干求,当折以天朝之法度;如其归心恪顺,不必责以中国之仪文。”

继而李元度稍作更改,于同治五年刊行的《国朝先正事略·孙寄圃相国事略》(简称《事略》)上称¹³:

嘉庆二十年,英吉利入贡。其使不能行三跪九叩首礼,廷议以其崛强遣之,睿庙不悻。公适述职京师,召见垂问,以公尝抚粤,悉夷情也。公面奏:“乾隆五十八年,英夷贡方物,使至京,已不能效中国礼拜之仪。其大班曰同嘴咚,尝于广东巡抚署拜领大皇帝赏物,弓身俯伏,臣亲见之。译者曰俯伏者,夷礼之免冠顿首也。今贡使即同嘴咚,未有谨于彼而骄于此者。”

这一记述成为流行版本,被广泛征引。如,同治时期刊印的黄钧宰《金壶七墨》金壶浪墨卷二、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民国时期出版的杨忠羲《雪桥诗话》卷七、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九十六、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三、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三十四《四裔考四》,皆沿用了此则史料。

11 (清)彭昱尧:《致翼堂文集》卷二《前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孙公家传》文尾附有唐启华注“此丁未子穆客广州时作”,即道光二十七年。见于王春林:《致翼堂诗文集》校注,页142,广西大学硕士论文(指导教师:陈自力),2000年。

12 (清)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孙玉庭家传》卷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981册,页132,文海出版社,1973年。

13 (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一,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538册页467-46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其实,《家传》对孙玉庭面奏内容已有所删减,《年谱》所载内容更为细致且略有差异。据《年谱》称¹: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七月到京。召见,时值英吉利国贡使不能行三跪九叩首礼,谓其崛强,遣回本国,上意不怪。……余遂奏:“该夷贡品向系海船带进。至乾隆五十八年,该夷专遣贡使航海至天津贡方物,彼时夷使到京,即闻其不能效中国跪拜之仪。至嘉庆九年,臣于广东巡抚任内,适逢有答赏该国王之物,会同督臣传该国大班名同当咚者入见,吏役引至大堂前站立,该夷摘帽弓身俯伏。通事传谕大皇帝有答赏各件,令其敬谨赍回。该夷弓身如前状,即随赏件步行护送至该夷寓所。方该夷人入见时,见其两腿裤袜绷紧,直立而不能曲。其俯伏者即夷礼之免冠顿首也。今届贡使即系同当咚,岂有在广东则恭谨,到京师反敢崛强者乎?……故臣以为彼如妄有干求,必当折以天朝之法度。若势有不能,不必责以中国之仪文。”

显然,《家传》删减了《年谱》部分内容:《年谱》中“即闻其不能效中国跪拜之仪”点明只是听闻,而非亲见,因为孙玉庭于五十七年提调粤西乡试,乾隆六十年春才入都召对,故而,此事只能是其辗转听闻;《年谱》点明斯当东拜领赏赐一事在嘉庆九年,非乾隆间事,而这在《家传》、《事略》中都被删减。故而,从《年谱》至《家传》再到《事略》,文字删减、传抄中传递了错误的信息印象。

再则,前文论及英人著作中的相互矛盾的观点,故而,据此而成的薛福成的“行西礼”一说不成立,推而论之,清代社会一度流行的马嘎尔尼“行西礼”的说法也不正确。

除了薛福成外,光绪时期还有些笔记、报纸和著述认同英使行西礼说,如,《水窗春呓》²、《周礼政要·朝仪》³、《异辞录》⁴、《泰西朝贡考》⁵、《追纪西使陞见盛典》⁶、《论宜遴选使才以重其事》⁷、《中西礼节悬殊不必强同论》⁸、《书议和全权大臣奏各国使臣觐见礼节折稿》⁹等。

综上所述,道光以来,清人相关记述逐渐分流,以往乾隆、嘉庆时期官方撰述的主流观点继续存在,同时西礼说出现并广泛流传开,三种态度各擅其场,并行不悖。西礼说的出现影响甚大,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后世讨论的基本论调,甚而民国时期就有文章讨论觐见礼问题。

11 (清)孙玉庭:《寄圃老人自记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19册页601—60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12 (清)欧阳兆熊、金安清(谢光尧点校):《水窗春呓》卷下,页30—31,中华书局,1984年。

13 (清)孙诒让:《周礼政要》卷上,《四库未收书辑刊》第4辑第5册,页27,北京出版社,2000年。

14 刘体智:《异辞录》卷一,页59—61,中华书局,1988年。

15 佚名:《泰西朝贡考》,《申报》1876年8月4日,第3版。

16 佚名:《追纪西使陞见盛典》,《申报》1891年6月7日,第1版。

17 佚名:《论宜遴选使才以重其事》,《申报》1892年7月10日,第1版。

18 佚名:《中西礼节悬殊不必强同论》,《申报》1897年4月11日,第1版。

19 佚名:《书议和全权大臣奏各国使臣觐见礼节折稿》,《申报》1901年12月6日,第1版。

四 结语

自乾隆五十八年以来，清人有关马嘎尔尼使团觐见礼的记述变化明显：乾隆时期官方记述讳莫如深，民间记载众说纷纭；嘉庆二十一年以后，乾隆英使“恪恭如仪”一说正式提出，改变了乾隆时期官方档案语焉不详的态度，奠定了其后清人相关撰述的主流观点；同光时期，西礼说相继现于报端、奏折，影响深远。

这种变化与乾嘉以来中英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乾嘉时期，清廷仍抱着天朝上国的观念，试图将中英关系纳入到传统的朝贡体系之中，随后一系列中外条约的签订，总理衙门的建立，清廷传统的朝贡体制及觐见礼仪已经无法维持，急需做出改变。同光时期盛行的“准行西礼”说将容许西礼觐见看作是清帝对外国公使的优待，表面上来看是援引旧例提供政治参考，实际上却是为解决当时的外交困境提供了历史与理论依据。除此之外，清廷出洋公使以及各种报纸等出版物对西洋外交礼仪及其事务的介绍与传播也是此说形成的重要土壤。同时，西礼说之所以能够得到认同主要是因为仍将西礼觐见纳入传统朝贡体制的礼仪意蕴中，适应了清廷固守的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因此乾隆以来，有关马嘎尔尼使团觐见礼的记述虽屡经变化，但实际上都未脱开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及其外交体系。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宋仁桃)